

一本当代美国人生活最令人钦佩的评论

[美] 迈克尔·B·凯茨

沉默的大多数

——美国工人阶级家庭生活



[美] 莉莲·B·露宾 著

汪泽青 张卫红 译

齐振海 审校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D417.127
L892

沉默的大多数

——美国工人阶级家庭生活

[美]莉莲·B.露宾 著

汪泽青 张卫红 译

齐振海 审校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默的大多数:美国工人阶级家庭生活》/(美)露宾著;汪泽青,张卫红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7
ISBN 7-80173-031-3

I.沉... II.①露...②汪...③张... III.工人-生活-状况-美国
IV.D417.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9160 号

《沉默的大多数——美国工人阶级家庭生活》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1-2718 号

沉默的大多数——美国工人阶级家庭生活

著者	[美]莉莲·B.露宾
译者	汪泽青 张卫红
责任编辑	李正堂
封面设计	夏 风
出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博雅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32 开
	7.5 印张 180 千字
版次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书号	ISBN7-80173-031-3/Z·011
定价	14.5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79032 64271187

献给玛希和保罗

在他们为自己建造一个新的家庭
的奋斗中,我分享他们的
爱、希望、欢乐和痛苦



莉莲·B·露宾博士，
国际上认可的社会学家
和心理学家、家庭问题
专家。纽约综合大学皇
后学院杰出的社会学教
授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
克利社会变迁研究所资
深研究员。有多种著述，
其中《亲密的陌生人
——今天的男人和女人》
已有中译本出版。

责任编辑：李正堂

封面设计：夏 风

目 录

重访沉默的大多数:1972 至 1992 年.....	1
第一章 导论	30
第二章 家庭	42
第三章 他们怎样成长?	50
第四章 他们这样结合	75
第五章 婚姻:梦想和现实——开始的岁月	93
第六章 婚姻:梦想和现实——中期的岁月	115
第七章 变化着的期望:新的考验	134
第八章 婚床	153
第九章 工作的意义	174
第十章 休闲的质量	202
第十一章 沉默的大多数	219
结束语	226

重访沉默的大多数：1972 至 1992 年

在《沉默的大多数》接近尾声时，我写道：“在此我仅仅描绘的是一幅画，一幅静态的画，是一部观众已经离去很久剧院却仍然在放映着的电影中的一个缩影。”自从我致力于研究这部书以来，20个春秋已经过去了；但这部电影仍在继续放映。现在应是再次停映的时候了，其主旨是为了进一步展示当今美国工人阶级生活的另一幅画卷。

阶级的问题

在 1972 至 1992 年的 20 年间，巨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变化已经波及到就业领域，客观上需要反复界定家庭和社会生活，男人与女人间的关系，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以及构成美国生活各个方面多姿多彩的不同种族和民族群体间的关系。但我们还无力很实际地触及阶级的问题，因而只得使这一问题保持相对不变。

在某些方面，1992 年阶级的界限要比 20 年前更加明显。20 世纪 80 年代狂暴的公司支出和里根与布什的管理政策把富人的腰包填得鼓鼓的，而普通工人却未能从中获益。多么强烈的反差！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之间，这是在本书里经过比较的两个群体，差距比以前更大了。即使包括女性对经济的贡献，若以 1989 不变美元价格计算，中等家庭的收入实际上保持基本平稳。1973 年中等家庭的收入为 33656 美元，而 1989 年为 34213 美元。与此同时，夫妻共同工作挣钱的家庭却有所增加，这就意味着男性实际工资下

降。只有占美国家庭五分之一的高收入家庭的收入稳定增长,在1980年至1990年10年间,收入从73764美元上升到92663美元。

但是那是**客观**的现实。就主观层次而言,某些方面还在继续发展。在我看来,我们是**阶级意识在逐渐降低而种族问题在日益突出**这一观点的见证人,即如果说组织起来的劳动力数量是阶级意识的一种表现的话,那么很显然,1992年比20年前组织起来的劳动力数量要弱小得多。在白种工人中,一旦他们回避正面反对剥削,那末劳动工会的成员就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20%减少到80年代末的15%多一点,这是怀有敌意的政体教唆的一个败例。

在工人阶级的命运急剧低落时,工会曾经提供的各种保护变得越来越不起作用了,对于超越工人自身能力控制的命运,留下的只是剧烈的伤害。这似乎是阶级义愤运动的一种理想状态。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已经看到了种族义愤的逐渐增强,其程度超过了近年来我们所能熟知的任何事物。

1972年,前纳粹党人和前三K党大法师大卫·杜克,或许会对竞选台一笑置之。但20年后,他却能在路易安那州竞选州长并赢得55%的白人选票。20年以前,巴特瑞克·布坎南,一位富有的、右翼的、从未担任过公职的共和党的新闻记者,几乎不可能在竞争总统府宝座时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但在1992年竞争总统候选人当中,他却足足地赢得了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选票。经济上的不尽人意是选票投向的棘手问题,这是事实。而相当多的美国选民可以从这些候选人的有关种族主义、对陌生人和外国人的不合理憎恨或恐怖的种种解释中找到致使经济不尽人意的原因,这也是事实。

阶级问题在1992年的总统竞选政治策略中已变得特别糟。在半个多世纪经济陷入最长的萧条时期的背景之下,民主党与共和党都把希望寄托在不断忏悔、受到爱的痛苦折磨的起诉者、他们称之为“中产阶级”的人身上。对于“中产阶级所受的种种压制”,

他们说些安慰同情的话，并承诺以各种方式予以帮助。而他们又向谁求取支持呢？共和党人正试图固守居住在城市的白种工人阶级选民，这些选民是在最近的总统选举中背叛民主党的那些人；而民主党人则打算再次出击把这些人争取回来。他们认为，“中产阶级”这个词至少是选举年对“白人”的一种习惯性称谓。与此同时，两党似乎都准备以这部分储备增加各自力量。正如格温·伊菲尔在《纽约时报》中具有讽刺意味地指出：“应当使用‘需要’一词。有时似乎已对中产阶级进行了很现实的重新定义，即是那些被认为有能力达到年薪5万美元甚至更多的那些人。”

事实上，所有对于中产阶级的讨论都是为了达到混淆阶级现实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划清阶级界限，因为“中产阶级”通常被广义地定义为除了富人与穷人之外的任何人。比如，国会预算部长认为任何年收入在1.9万美元至7.8万美元的四口之家都归入中产阶级，其范围如此之广以至于阶级的划分对于除政治家们以外的其他任何人都变得毫无意义。可以想象年收入为1.9万美元的家庭和与其相比年收入四倍之多的家庭所经历或所选择的 lifestyle 会一样吗？他们真的会面临诸如找房子、获得健康服务、为孩子买鞋或准备食物等同样的问题吗？

民主国家委员会的政治领导人已提供了一个狭义的但同样是有缺陷的定义。他说，民主党人所设法争取的、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的选民是由45岁以下、父母全日制工作、有两个孩子、居住在郊区、年收入达3.5万美元的家庭所组成的。值得注意的是他证实1992年要求妻子与丈夫全日制工作，全年收入达3.5万美元，这与过去相比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他这样对比以掩饰问题，似乎毫无意义。因为更重要的是1989年两个人工作的中等收入家庭的年收入为45266美元。既然收入是划分阶级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那么民主党人的“典型中产阶级家庭”就不具备这一标签所要求的资格。但是承认工人阶级的存在是向美国具有影响力的科幻

小说所宣扬的国家已经征服了招人怨恨的阶级差别之观点的挑战。然而政客们的花言巧语支持并加强了这一神话,即我们是在一个无阶级的社会里,这一神话在过去 20 年种族分化日益普遍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后,在定义中产阶级时,两党的政客们都没有考虑工人阶级的工作性质及他们应如何得到补偿。这对于是否蓝领或服务工人应按小时支付工资而白领工人应按周支付工资这一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在经济的危难时期,按小时领取工资的工人总是更易受到损害。

自 1990 年春开始进入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以来第一次经济不景气时期,失业冲击着白领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二者失业的人数已达蓝领工人的三分之二。尽管新闻媒体报道有关股票经纪人、律师、行政人员和哈佛大学毕业生还未找到工作,但是低层次的销售人员和办公室中的白领工作者受到的打击最大。例如,1991 年 11 月,经理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失业率达 2.9%,而低层次的白领工作者失业率高达 6%。

无论失业者从事何种档次的工作,我都无意否认失业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对于女性失业或者男性失业来讲,无论其失业率为 2.9% 还是 6%,它们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然而,如果将这两类失业率与同期的、挣扎在失业线上的蓝领工人的失业率相比就显得不那么强烈,在此期间,操作工和劳工的失业率为 9.8%,制造业工人的失业率为 7.3%,建筑业工人的失业率令人吃惊地高达 16%。

女性劳动力

如果假设美国各阶级的生活性质保持相对不变的话,那么工人阶级家庭内部的生活自 1972 年以来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质变。

一个作家所描述的“丈夫在外工作,妻子在家当家庭主妇的家庭模式”已经受到了数次戏剧性的挑战。但是充分意识到挑战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变化之重要性还不明显。而现在却明显了:1972年呈现出的趋势已于1992年变成了注定的现实。

20世纪70年代,经济开始席卷美国海岸一带,海岸上的工人阶级家庭迎来了又一个20年。在此期间,二战结束后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地慢了下来。在劳动力逐渐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过程中,过去曾经作为工人阶级积聚财富基础的成百上千个制造业的就业机会随之消失了。在即将进入20年中期之际,国家正陷入经济的衰退之中,这一点蓝领工人体会得最为深刻。在制造业、建筑业和其他相对高薪行业的男性失业者,如果他们能相当幸运地找到工作,被迫安置到低薪的服务行业。而继续留在同一工作领域工作的那些就业者却发现,由于他们的工资赶不上通货膨胀的变化,因而他们的实际工资变得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妇女涌入劳动力市场,从而弥补家庭收支不平衡所带来的赤字。

因此,今天,当我们偶然拾起一份报纸却没有发现相当多的带孩子的已婚妇女充斥于劳动力市场中,则是一件异乎寻常的事。社会学家研究这种情形;政治家们吃惊地绞动着双手,并对家庭影响表示担忧。而贫穷的妇女们已经担负起家庭之外有报酬的工作。事实上,在这部书中提到在20世纪70年代,有58%的妇女成为劳动力中的一员,她们中的大部分从事兼职的工作。那么对此为什么在1992年会引起公众的热切关注,而在1972年却很少有人抱怨呢?

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数据有关,这一数据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经过数十年已经有了戏剧性的增长。在20世纪60年代初,18.6%带有6岁以下孩子的已婚妇女在外工作;而在60年代末,这一数据已猛增到30.3%,增加了11.7个百分点。70年代又急剧增长到45.1%。直到80年代末,就有58.4%的妇女成为劳动

力,这一数据相当于 60 年代同类数据的 3 倍以上。

至少同样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在 20 年前,很少有已婚带婴儿的妇女就业。而现在大约有一半带 1 岁以下幼儿的母亲至少正在从事兼职的工作。孩子越大,不仅在家干家务而且在外工作的妇女越多。1970 年,带有 6~17 岁孩子的已婚妇女在外工作的比例仅为 49%,而在 1980 年,这一数字上升到 61.7%,到 1989 年这一数字急剧增长到 73.2%。

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即在 1972 年从事兼职工作的妇女很可能在 1992 年为全日制工作者。显然这些数据并不是简单的统计描述所能解释得了的。但它们却代表了家庭生活的主要变化,相应地对公众生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全日制工作的妇女人数的急剧增加不仅在公共领域而且在私人王国中有力地强化了性别角色的重组,以前是受过教育的各界精英所进行的一种抗争,而现在已成为各阶级妇女意识的组成部分。

但是这些巨大变化不是向公众警示妇女在工作和家庭地位上升的惟一原因。阶级因素也起到部分作用。1972 年,只有贫苦家庭与工人阶级家庭需要妻子在外工作以应付家庭开销。而 20 年以后,这一现象已普遍于除富人家庭以外的几乎任何一个家庭。当仅仅是较低阶级的人感到痛苦时,这些问题很容易被政府官员和政治家所忽视。或者即使他们注意到了,他们也会将其解释为事物发展“自然”规律的一部分,生活中的一个事实就是有较少的幸运会持续降临。而当这种痛苦真的触及到中产阶级时,包括与他们没有什么不同的亲属家庭、朋友家庭、邻里家庭,加之,这些家庭往往通过社会的、政治的、财政或金融的渠道来反映出他们的不满时,那么,便会引起政治家们关注,家庭状态也就成为一个公众所关心的问题。

家庭生活的变化和继续

尽管事实上在这本书中的很多处所提到的相当多的妇女在家外从事有报酬的工作,但这些妇女却都把自己界定为妻子和母亲,而不是工作者。工作的确是她们所做的某些事,是服务于家庭经济需要的一种工具性活动。她们或许会自我感觉良好,因为每天外出工作几个小时,在那里使她们的能力得到认可。但是家庭主妇和母亲的角色仍是她们自我界定的核心;这~~就是~~过去她们对自己的角色定位。

当然,有时她们也需要丈夫的帮助,然而传统的家务劳动似乎一般都由她们自己去应付。她们与丈夫同样认为整天努力工作的丈夫有权回到家,抬起脚,期待着妻子舒舒服服的照顾。而且她们对一些微小的帮助心存感激:丈夫偶尔帮助她们清理餐桌、擦拭餐具,了解怎样使用真空吸尘器,有时“临时受雇照料”自己的孩子。

并不奇怪,在那时,当被问及对妇女解放运动的看法时,她们的观念与当今时尚大相径庭。她们抱怨:“妇女解放运动”使她们处于被轻视状态,因为她们选择的是婚姻和母权,而不是职业;或者她们干脆认为妇女解放运动所涉及的问题与她们的生活无关。甚至当问及有关同工同酬的问题时,大部分人处于自相矛盾的状态,一方面认为那是公平的,但另一方面又说如果男人要养一大家人,而女人没有一大家人要养,那么男人就应该挣得比女人多。

直到 1992 年,变化了的形势带来了变化了的希望。正如我所写到的,我刚完成了一项有关工人阶级家庭生活的最新研究。为进行这项研究,我所采访的妇女无论在阶级上还是在地位上都与 20 年前我所采访的妇女相匹配。而她们之间的差别却是显而易见的。今天,大部分的工人阶级妇女不再认为妇女解放运动的目标与她们实际生活间的距离是那么遥远。她们也许仍然否认与女

权运动有任何的联系,仍然给自己贴上原有的标签并畏缩于这一标签之下,但那只是形式掩饰实质,习惯掩饰现实罢了。这是她们不赞成当今“女权运动者”这一称谓的唏嘘之声。事实上,与以前数十年女权运动兴盛并存的经济状况已经转变了她们的有关家庭生活与家庭角色的观念。

1972年,外出工作的大部分妇女都感到愧疚地谈到他们从工作中所获得的喜悦,好像她们背叛了她们的家庭,但承认某些其他的东西能够引起她们的兴趣并给她们带来满足感。20年以后,我所采访的大部分妇女自愿承认虽然她们或许由于经济上的需要而外出工作挣钱,但她们的确享受到了工作的恩惠,不会自愿离开工作岗位。她们无疑会谈到她们所珍视的逐渐增强的能力感,强烈的自我尊重感,商议和精通复杂工作能力的天赋,最后但很重要的是外出工作也是她们经济上独立的一个标志,从而使她们更加成熟,更能驾驭自己的生活。

20年前,丈夫和妻子通常宣称虽然他们的收入可以自由支配,可以买一些奢侈品,但却负担不起像买新汽车,过野营生活,外出度假,为起居室添置新家具所花费的费用。有时这是真的。但通常这种解释是建立在妻子保护丈夫不去努力掌握相关知识基础上的一种借口,结果使得丈夫不能挣足够的钱使得家庭收支平衡。直到1992年,这种虚伪的说法不再奏效;现在每一个人都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即如果一个家庭要想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处于良性循环状态,那么女人就必须去工作。这种不同于以往与她的丈夫一样认为妻子工作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观点,使她爽快地承认以前所未曾认识到的自身的另一面。她也许会继续诠释自己最主要的角色就是妻子和母亲,但对于工作者这个次要角色的自我界定已不再与她的感觉背道而驰了。

因此,在我最近的研究中,大部分妇女十分鲜明地赞同同工同酬的原则,而在20年前与之相匹配的被调查者还对此观点持模棱

两可、情绪自相矛盾的态度。同样地，她们也不再认为男人回家后有权放松休闲，而他的妻子却忙着收拾玩具和脏衣服，准备晚餐，然后清洗餐具，打扫房间卫生，争取给孩子们一些“优质的时间”。如同她们的职业中产阶级的姐妹们一样，她们也希望她们的丈夫能够承担起管理家务、带小孩的任务。而当这种愿望真的转变为一种需要时，便常常成为家庭冲突的导火线。

的确，现在妻子在外从事全日制工作，并赞同妻子应当外出工作以助于家庭生活，甚至若妻子不在外工作会感到愧疚的男人很有可能比 20 年前要多。但通常语言与行动之间要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而很多丈夫料理以前通常由妻子单独承担的家务，这也是事实。许多丈夫如果回家早于妻子，他们会忙着准备晚餐；有些丈夫还帮助清理家务，帮助孩子洗澡或帮助孩子就寝。但总是用他帮助她这种术语，而不是用平等地分担家务和家庭责任这种术语。这就意味着如果某项家务适合他，而他若感觉太累或负担太重，他就可以免做。

甚至在妻子与丈夫工作轮班的时间不同的家庭里，我所采访的很多妇女都抱怨丈夫只做所要求的最小限度的家务，而且只在被提醒必须做的时候才去做。“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家务应必须做，所以如果我不告诉他，家务就只能置之一旁。”一个白天丈夫工作晚上自己工作的 34 岁的妇女抱怨道：“就是这样，每天他告诉每个人是他做的晚餐，但那只是在我准备好了一切并放在容器中。然后由他在炉子上点火或打开烤箱。那么，谁在做饭呢，我问你？”

在这么多的变化发生之际，当妻子与丈夫共同承担家庭负担成为现实的时候，为什么男人仍然能够很成功地抗拒家务管理全权伙伴这一责任呢？原因很复杂，对此我已在其他作品中很详细地做过一些描述。最基本的观点就是不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社会领域，妇女比男人更易受到伤害。从社会现实的角度上讲，离婚男士再婚的机会要比离婚女士再婚的机会多得多。若与男性同龄

组相比,年龄在 25 至 44 岁之间的离婚女性只有 65% 的人有可能再婚。当女人超过 45 岁时,再婚的机会便急剧下降。从经济的角度上看,当婚姻以离婚而告结束时,妇女与儿童通常处于极严重的危难之中,分析家称这一现象为“贫困的女权运动化”,这是 20 年前所不为人知的一个短语。

劳动力市场上歧视性惯例是维护男女之间权利不平等的有效工具。1989 年女性的平均年收入为 17606 美元,而男性的平均年收入为 26656 美元,这就意味着若男性能挣 1 美元,而女性只能挣 70 美分。但这也确实比 20 年前女性只能挣 59 美分的差距要小。现在,妇女不仅有更大的独立意识,而且在与她们的丈夫交流时有略微多一些的发言权,但这还不能足以使女人与男人拥有同样的经济条件。

男女收入差距的通常解释是大部分女性从事一些低技能、低薪水的工作。但这种说法却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无论工作所要求的技能水平如何**,女性的薪水总要比男性的薪水少得很多。受过八年级教育的叉车操作工的薪水要高于具有大学学位的秘书的薪水。**那是女性,因为没有技术,从而产生了收入差距。**事实上女性收入少于男性,只是因为她们被支付的薪金少而已,即使通常在她们做与男性同样的工作而且具有同样经验时也是如此。最后,玻璃式的天花板的限制了女性工作的流动性,因而往往不能获得一套办公用房。总之,无论是对工厂监督管理职位的提升,还是对外科医师的认可,在职业等级制度的各个阶级上都会强烈地反映出男女之间的不平等。

婚姻之外的社会经济的不平等使得女性感到婚姻内在的不平等。当妻子面临丈夫拒绝分担家庭责任时,妻子很有可能会考虑到据理力争所付出的代价,最后决定放弃要求才是稳妥之举,其目的是努力捍卫婚姻的利益,维护家庭的和平。事实上,现在提出离婚的女性要比以前多,毋庸置疑的是这是与日益增强的女性经济